

唐文治编纂《十三经读本》论略

○ 茆 萌, 陈国安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唐文治早年就学于南菁书院,后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主校无锡国学专修学院。书院的经学传统和治学方法深刻影响了唐文治后来的学术和教育道路。及至他创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之后,时移世易,唐文治认为有必要编纂一部十三经的读本以传承经学、匡正世风,经五年之功终成《十三经读本》。以读本为教材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先后培养出唐兰、钱仲联等国学大师。探源《十三经读本》并以此为线索,就其背景、体例、内容和之于当今高等教育的意义作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唐文治;南菁书院;《十三经读本》;经学

我国晚近坚守文脉者颇多,太仓名士唐文治便是其中一员。唐氏生于书香寒门,曾历任清代户部主事、商部左侍郎等。丁忧后,他掌校上海实业学堂十四年。1920年唐先生以“学风不靖”为由,解职回锡,并于年底与无锡施肇曾等共同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他敢为人先、陶铸群伦,秉持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人格教育”,是为我国一代教育大家。二十世纪初,“新道德既茫无所知,而旧道德则扫地殆尽”,唐文治在为教育事业尽瘁的同时,亦成为我国经学文脉的坚守者和推广者。

唐文治精研经学,有《茹经堂文集》等著作存世,在主校上海实业学堂期间,因“苦无国文教授善本”而编著《国文大义》等教材。在无锡国学专修馆时,唐文治为了传承经学、匡正世风,集众人之力编成《十三经读本》。唐文治编纂《十三经读本》是晚近“经世致用”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在唐文治看来,《十三经读

作者简介:茆萌,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晚清近代文学研究;陈国安,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及明清学术史研究。

本》不仅要能传承、传播经学,还要能“正人心,救人命”,在开启民智的同时,探索救国的道路。读本编著历经六年,汇集唐氏所选十三经善本、昔人评点和唐文治所撰提纲。经学向来艰涩难读,而唐氏《十三经读本》则微言大义,由唐先生采其“注之简当者”,以期读者“如亲聆古人之诏语,无复向者艰涩不通之患”。《十三经读本》于1923年编成,其时中国正风雨飘摇,因而文本不仅坚守了文脉,更以“拯斯道之厄”的旨意承担着坚守国脉的使命。这即是唐文治编纂《读本》的重要意义。文本既是晚近重要的经学读本,也作为教材影响了无锡国专的众多学子。在《十三经读本》的引导下,无锡国专先后有唐兰、王遽常、钱仲联等一批大家,从事经学、文学研究,一主文史之盛。《读本》渊源与书院密切相关,而其实效亦见于当时的高校文科教育当中。因而本文拟以此为线索,探源《十三经读本》,对编纂者唐文治在南菁书院所受经学教育及其影响作一探究。在此基础上,确立《读本》在我国经学发展、传播中的地位,明确其编纂意义。继而探索其之于当今高校文科教育的意义。

一、溯源:《十三经读本》与南菁书院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传统的教育组织方式,在学术发展和学术传承方面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嘉庆道光以降,清朝国力不逮,承担传统经学传承重任的书院,在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寻求传统经学的出路,担承文脉乃至国脉责任。“时务方兴,而儒者左矣”,时运艰亟时,江苏学政黄体芳为了招揽贤士、传承儒经之道并“务为反经以求其实”,在江阴创建了南菁书院。南菁二字取自朱熹“南方之学得其菁华者”。书院始于光绪八年(1882),成于九年(1883)六月,主校的先后有黄体芳、张文虎、黄元同等。唐文治于1885年赴书院应试,取得超等入学。三年的书院生涯不仅让唐氏在儒理之学上更加精进,也直接影响了其日后主校办学的决策。

在南菁书院,经学的传统和传承是为核心。“文学溯薪传,礼仪表茅莛”,主校黄体芳认为,儒经之道在当时不仅能揽才、兴邦,还能应对世道“无穷之变”。他常言“使来学者不忘其初,而袷祀汉儒郑公及朱子于后堂,使各学其所近,而不限以一先生之言。”^[1]在黄氏看来,来学者或可成才,而人才则是一国之必须,对于国家来说,“须才之事”虽然日新无穷,但其前提则是“充其本原”,以原道之不变应国家事务之万变;而对于人才来说,不仅要求经学讲原道,还要通历代之经典,明众贤达之感言,这样才不会偏废一科而“忘乎天下众人之利心”。在张文虎因足疾退隐之后,黄体芳延请黄以周主校,以巩固南菁这一经学重镇的地位。唐文治于书院沉浸三年之久,除了在周、程、张、朱诸家集中沉潜反复外,还在黄元同先生门中初得汉学各经家之法。唐氏著有《南菁书院日记》一册详录书院三载的日用言动。在“比年官京师,目击世道人心”之后,唐先生亦曾以“明忠孝之大旨,辨义利之根源其体也”“究民生之利病,裕经世之大猷其用也”论学问之道。其中这经世之学的道义,便是由南菁三年求学感慨而来的,此般感慨也

成为日后编著《十三经读本》的重要缘由之一。而这经世的道义也恰是南菁书院一直推崇的传统。

除了治学的传统,南菁书院的课业设置和“专课通省经、古”的治学内容,对唐文治自此之后的治学影响很大。钱师仲联回忆,“年轻时在无锡国专学习时,唐文治校长的治校方法,有不少就是从他的母校南菁书院借鉴来的。”^[2]书院的最大特点便是“课生主要以自学为主,院长指导为副,所以,南菁书院始终只有讲学的活动,而没有现在学校上课的形式。”^[3]在校时,学生往往春诵夏弦,以“经史疑义”等,滔滔辩论,与此同时“不炫异而矜奇,惟实事以求是”。^[4]书院设有其专门的藏书楼,“吾苏文献几可取征于此”。同时,书院院长指导学生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学以致用,让学生整理校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据书院学生孙同康晚年的回忆,集元同师一生精力所萃的《礼书通故》一书,便是其与唐君蔚芝、章君琴若等一同参订的。^[5]除整理之外,书院还鼓励学生搜集资料、研究课题,唐文治回忆黄以周晚年精力不逮之时,曾集南菁讲舍诸生之力广为搜罗经集。在书院诸生的努力下,书院复得若干经册,并加注刊刻。^[6]此外黄体芳常常捐廉为倡,尝募款三万三千串钱作为书院学生的膏火,在保证书院继续运作的同时,也为刊刻经集提供了保障。据此纵观唐氏所创无锡国学专修馆,无论是学校建制还是治学方法,课程设置还是课业内容均基本与南菁书院同。

在这其中,南菁书院的编刻著述传统影响着唐文治。据考,南菁书院编刻的著述分为两类,一类为学生学习成果的论文集,另一为编刻前代贤儒著述。主校黄以周分别在光绪十五年和二十年,两次甄选南菁书院优秀文章,编成《南菁讲舍文集》和《南菁文钞二集》各六卷。其中,唐文治有《读〈汤誓〉》《汲黯论》等八篇文章入选《南菁讲舍文集》。唐氏在无锡国学专修馆时,也编有《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几与南菁书院同。而南菁刻汇先贤丛书自光绪二十年(1886)夏始。时王先谦掌校并在书院设刊刻之所汇刻《皇清经解续编》。《续编》仅以书院之力难以刊全,于是王氏又在苏州书局的协同下,完成了另二百四十卷的刊刻。^[7]南菁书院包括唐文治在内的很多在读学生都参与了书稿校注的工作。南菁书院参与汇刻的经历对唐文治影响至深。就其日后主持《十三经读本》编汇来看,所采方法与南菁时基本相同。无锡国学专修馆在读学生也基本都参与了校注工作。由上我们发现,唐文治的治学取向、教育决策和方法与南菁书院几乎一脉相承。读经、解经不仅占据了他治学的大部分时间,这种传统也由此深深根植于唐氏心中。因此在时势飘摇之时,唐氏毅然坚守传统“经世致用”,选择编刻《十三经读本》。这一文脉溯源可作读本编选之重要缘由。

二、《十三经读本》的成书背景、体例、内容

《十三经读本》编纂自1918年始。其时,时势混乱,战祸频起。国内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的声音日盛。在持见者中,也不乏很多学者提倡“废经”之说。此时,唐文治已在工科学堂内主校并推崇国文教育数十载。在这样的背景下,面

对世界之劫运,以及日渐出现的推崇经学的阻力,他尝哀叹“嗟乎!斯道之天下,其将澌灭矣乎!”在他看来,“废经”后则礼法无处可循,孝悌廉耻不存,人则“无异于禽兽”,因而唯有“治经”才能挽其流者。“近时吾国学生皆畏惧读经,苦其难矣”,唐先生在力挺“治经”的同时,也认识到了新的社会形态下,青年学生对“经学”的惧怕心态,从而未选择直接刊刻《十三经》,而是选择编选《十三经读本》以供普及,拯斯道之厄。

读本编写逾时五年。在这以前,唐文治搜罗《十三经》善本及文法评点之书,已有十余年了。^[8]1918年冬,唐文治亲自撰写《十三经提纲》置于所选各经前,供读者通读用。及至1921年,《春秋三传》《论语》《孟子》等诸卷成。当时唐先生已离开上海实业学堂,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馆,其与资助创办专修馆的施肇曾商议将《十三经读本》付梓。隔年,《读本》刊印完竣。1924年,唐纂《论语大义》成,唐先生又将这一册补附刻于读本后,完成最终的全本。读本以唐氏历年收集的十三经善本为主,“自宋谢叠山先生,至国朝曾文正止,凡二十余家,颇为详备”,冠以提纲,“附刻先儒说经世鲜传本之书,而以评点文法作为札记”,读本前有陈宝琛、印光法师、唐文治和施肇曾序,凡例和总目。纵观来看,《十三经读本》从版本的择选到成书的过程和方法,颇有南菁书院的遗风。

虽然《十三经读本》在渊源上溯本南菁书院编刻传统,在编刻方式上与书院操作方式类同,但其在内容上却与书院所辑截然不同,颇具特点。有研究者指出经学教育从按照原本讲授到编写教科书以供参考,展现了时人“努力在新式学堂教育体系内将固有学术进一步妥善安置的尝试”。^[9]当我们把《十三经读本》定义为一部经学教科书时,便可发现其在很多方面虽然溯源南菁,但已经体现了新时代的教材特点。从编撰宗旨来看,《读本》“所发明之道,乃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10],读本以“治经”为人之本、事之道,但其却具有更明确的现实意义,即直接对抗“废经”的风潮,重建我国文脉之道统。《读本》不似南菁书院汇刻的丛书一般,仅为保存原典、供经学者参考之用,而希冀在经学传统遭受西学重大冲击的时代,重新唤回时人对我国经学文脉的审视。从文本定位上来看,读本可定义为教材,而南菁书院所辑均为可供经学研究的大部头丛书。从内容上看,所收内容为唐文治累年搜罗筛选而来,所选内容带有其个人偏好,但也让读本本身独具唐氏风格。从编撰体例上来看,读本在卷本设计前设《十三经提纲》,提纲不仅可以作读本教材的导读,亦可以单独拿来作普及读本用,大大增强了这部经学教材的可读性,规避了一些经学艰涩的部分。

民主科学出现在我国学界视野后,传统经学融入现代学堂、课堂一度陷入困境。《十三经读本》作为一部国学专修馆的教材,为经学融入学堂呈现了一种可能性。唐文治择选并褪去了些经学的艰涩的面貌,用大义微言为经学重新走进现代人视野铺了条路。唐文治在读本中以经论当下,以经重立人心,以经再救人命。较于同期其他教材,《十三经读本》不仅论经,还探讨了当世、当国之命脉延续的问题。

三、《十三经读本》的意义

唐文治自南菁书院始,深受经学传统训练与影响;逮至其创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完成《十三经读本》的编纂,唐文治始终希图恢复经学在学术体系中的传统地位。和当时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一样,唐文治认为经学非但不是时代进步、历史发展的阻碍,反而是在新形势下保存民族性和文化根基的重要途径,其编纂《十三经读本》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此。

作为教材的《十三经读本》意义在于传承经学,且文本呈现简言奥义。

清代以前,虽各代治国理念、思想潮流不同,但对于经学的重视却从未改变;经学的存废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课题。然而清末民初,世界形势大变,西学成为年轻学子眼中救国救民的不二法门,此时,经学传承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个不得不讨论的问题了。

唐文治对当时的情势洞若观火,因而他在《十三经读本序》中开宗明义,讲秦代事,醒今日言。他提出,“秦时之书焚于有形”,现如今则书焚于无形;“秦时之儒坑于可见”,而当世之儒则坑于不可见。^[11]此言不可谓不严厉。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和形势下,本着知识分子对于学术传承的责任感,唐文治意识到,编纂一部注解齐全、便于查阅的十三经读本之必须。后人常将唐文治的《十三经读本》与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相较。仔细比照我们不难发现,较之《十三经注疏》,其一,《十三经读本》补全了注释仅止于宋的缺憾;其二,《读本》以初学者的阅读水平和学习需要为必须,极尽简言奥义。纵观成书过程,也可得见其特别之一二。其一,唐文治先生在搜集十三经善本时,注重“采其注之简当者”“芟其解之破碎而繁芜者”。由此可见,在确定文本的时候,唐先生就注重微言大义者,多以“不艰涩”为读本原典之条件必须。其二,他在文本后“复集昔人评点,自钟、孙以逮方、刘、姚、曾诸名家,参以五色之笔,阅十数年而成书”。^[12]唐氏在原典之上,还作第二层的标注和评点,把艰涩再褪去一些。最后,他抉其微言,撰写《十三经提纲》附在诸经之后,以提纲之现代作文之法来适应时人尤其是青年的阅读习惯。有学者指出,唐文治编纂《十三经读本》,“意在保存经典的真实内涵以原汁原味滋养学子”。^[13]唐文治使用典籍、录用原著的同时,也能注重结合理论,以当时青年的话语习惯、阅读习惯来重新进行阐释,不以“那种通论式的东西”示人,而采用通俗易懂的解读方式诠释经典。^[14]除此之外,唐先生还四处奔走,向青年学生宣导其读经之法:“只有本文熟读而精思焉,循序而渐进焉,虚心而涵泳、切己而体察焉,则圣道之奥,不烦多言而解矣。”^[15]言则须声,唐先生还创“唐调”,将诸经放到固定的调式中吟咏传唱。

唐文治深知,经学之传承在于后继有人,因而不仅要让年轻人有读经的需要和动力,同时也要为他们提供读经的材料和方法。唯有年轻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方能得其大义。《十三经读本》从书面上保存了经学古籍和各家注释,从使用上也培养了致力于经学的年轻学者,因而之于经学传承而言,可谓善莫大焉。

由此我们发现,唐先生在其时代洪流当中,并未选择随波逐流,反而对传统文学、教育进行坚守。现在看来,无锡国专办学的成功也多赖于唐先生的坚守。对当今高校文科教育来说,坚守文科教育的传统,坚守文学传统尤为重要。虽然选择坚守古文传统,但是在坚守方式上,唐先生并未选择传统的方式。他审度他的学生、学校氛围以及社会氛围,继而在新的时代里做出了并非传统的新选择,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传统经学的发展,对待传统经学教育的重塑。而这一点在当时并非易事。

《十三经读本》之意义还在于其落脚在匡正世风,教化民智。

其时,“废经”之声日涨,时人多以西学为傲。然而在很多有识之士的召唤下,“治经”的呼声也未曾消失。如严复在论国事时尝言:“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16]章太炎亦直指时人心态:“所谓今日一切顽固之弊,反赖读经以救者,何也?曰:有知识之顽固者,泥古不化之谓也;有情志之顽固者,则在别树阶级,不与齐民同群,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也。”^[17]在主张西学之人看来,大声疾呼经学不可废的这些士大夫,大抵是因循守旧之人,断不能适应时代之变化、知识之变革。但如唐文治这样一生致力于经学研究的学者,深知经学贯通古今、不受时代条件拘束的普适性,并为片面强调西学优于经学之人的急功近利而深感忧虑。唐文治多次称主张废经之人“无良”也许言重,但其对世界化浪潮中,中国国民性和文化根基可能丧失的忧虑,确实有其深刻性。有学者曾指出,唐文治本着强烈淑世的意念,开拓古文发展的方向,“以培养中国典型的道德人格,谋求透过文章与德行相修的方向,解放长久压抑下来的民族生命力”。^[18]《十三经读本》之所以从“读本”性质出发,充分考虑初学者的阅读需要和知识水平,即是出于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夫欲救世、先救人,欲救人、先救心,欲救心、先读经,欲读经,先知经之所以为经。”^[1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十三经读本》编纂的针对性是明确的,其内在逻辑亦是清晰的,其可行性也在相当程度上具备。

晚近诸家多有对唐文治《十三经读本》的讨论和肯定。刘声木在《莠楚斋随笔》中对《十三经读本》作了极高的评价:“近世所出巨帙,以太仓唐蔚芝侍郎文治编辑《十三经读本》为最……撰者固难能,刊者亦可贵,当此时势,犹欲以尊经为事,其识见固高人一等矣。”^[20]在刘氏看来,不仅唐氏所辑“为最”,其见识“高人一等”,唐文治编纂的文本,也能“由评点而文法显,文义明,盎然粲然,”让读者“如登康庄”。从《读本》中,青年读者如“亲聆古人之诏语”,并能“因文见道”,悟出正身、救国之理。陈宝琛在《唐蔚芝侍郎十三经读本序》中,也有颇多赞誉之词。他不仅对唐氏《读本》的编纂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肯定,还特别对唐文治在搜罗、编纂上所作的努力予以说明:“(读本)重在评点,因取宋元及国朝诸汝所评点经文,编为劄记,其搜讨之勤,并世不数见也。”^[21]

唐先生《十三经读本》的构画给了我们从“虚”到“实”的线索,将专学融入社会功用当中,将文史精髓化用进新时代发展的意义中。《十三经读本》的意义

并非教材之于高等专学课堂的意义这么简单,实则是专学、文学之于社会发展意义。唐先生一生坚持学以致用。他所讲求的用不仅是文史的功用,而更多的是文史之于社会的功用。他将高校文科课堂的阵地和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当中,以社会所用为治学要求。从他《十三经读本》的编纂以及实际成效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的功用已经走进了课堂当中。学生在《读本》里也并非只读得了古人的“圣贤书”,而求得了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治学选择。

唐文治在时代变革中,并没有选择做一个居庙堂之上、书房之中的学者,而是充分发挥其所学以启迪民智、匡正世风。近人张元济在《别唐蔚芝》中有“居官不肯随流俗,讲学还能证道心”^[22]的评价。这一点由唐文治所编《十三经读本》也可以看出。《十三经读本》虽然是一部经学著作,是一部经文汇编,但是唐文治却将受众尽可能地拓展,他想“救世”“救人”“救心”。这是他从南菁书院走出时,那些经世的思想、经学为本的理念带给他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南菁书院到唐文治是一种传承,而从《皇清经解续编》到《十三经读本》更是一种发扬光大。《十三经读本》的出发点自经学始,但是其落脚点却是在整个时代之上。

注释:

- [1] 黄体芳:《黄体芳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 [2] 钱仲联:《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 [3] 赵统:《试述江阴南菁书院的治学特点》,《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 [4] 唐文治:《章君琴若墓志铭》,《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八)。
- [5] 孙雄:《丹徒陈善余微君庆年逝世》,《赋七律四首哭之·旧京诗存》(卷一)。
- [6] 唐文治:《黄元同先生学案》,《茹经堂文集》(卷二)。
- [7] 胡适:《关于江阴南菁书院的史料》,《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27页。
- [8] 唐文治:《唐文治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76页。
- [9] 朱贞:《晚清经学教科书的编写与审定》,《学术研究》2014年第3期。
- [10] 印光法师:《增广印光法师文钞》,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376页。
- [11][12][15][19] 王桐荪等选注:《唐文治文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2、213、213、213页。
- [13] 余子侠、陈元:《唐文治与陈垣国学教育比较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11期。
- [14] 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选辑》(19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 [16] 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王拭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
- [17] 章太炎:《国学十八篇》,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第320页。
- [18] 邓国光:《唐文治古文批评探要》,黄霖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第19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
- [20] 刘声木:《清代史料笔记丛刊》,《菘楚斋随笔》,中华书局,1998年,第186页。
- [21] 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97页。
- [22] 张元济:《读史闡世》,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

[责任编辑:陶然]